

“诗不颤抖”：也论“干校文学”

——以牛汉的诗歌为例

彭在钦 杨经建

摘要：以现象学认知方式考量，“干校文学”不啻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其中牛汉的诗作具备了独特的价值涵义。这种价值涵义首先表现在，牛汉的诗歌吸纳了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品性和诗性气质，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履行了诗歌的文化批判与思想抵抗的责任。其次，领受苦难和生命担当是牛汉诗歌的一体两面的构成要素，即，对苦难的领受是通过生命的担当来完成的，与此相应的则是艺术风格上的悲慨基调。其三，用比较的眼光审视，在“干校”的特定语境中，牛汉、郭小川、杨绛三者具有创作类型学的意义：牛汉身上彰显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本色，郭小川则在“战士”与“诗人”的选择中逐渐凸显了“战士”特质，杨绛展露出的是淡泊自重、宠辱不惊的文人风度。

关键词：干校文学；牛汉；郭小川；杨绛；悲慨基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7-0139-06

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大事件之一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出现。胡塞尔认为哲学既不当从物质出发去解释精神——把精神还原成物质，也不应当从精神出发去解释物质——把物质还原成精神，而只能回到事情本身^①，通过将一切实体（包括客体对象与主体观念）加以“悬搁”而回到认识活动中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现象在意向性过程中显现本质，从而达到“本质直观”——现象学的还原”。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生命活动，而真正的生命活动只能是面向事物本身。“干校文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牛汉的诗歌。

—

当本文将牛汉及其诗作放置在“干校文学”或“流放者诗歌”^②的语境中予以阐释时，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识：“文革”期间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知识分子立场”，“没有自我、没有个性”^③。很明显，这种评判有其错谬之处，至少，牛汉有关干校的诗歌就绝非如此。诚如绿原在为牛汉诗集《温泉》撰写的序《活的歌》中所言，它们“大都写在

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从牛汉有关干校的诗歌中可以觉察到的是，“也许三位落难诗人（笔者按：指牛汉、绿原、曾卓）的隐匿写作告诉我们，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时期，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化批判与思想抵抗的责任。政治打击与社会迫害，逼使‘五四’精神在无声的中国悄然延续”^④。而笔者从牛汉有关干校的诗歌中感受到的则是一种俄罗斯十二月党人面对民族苦难时呈现出的那种悲忧、沉郁、高贵、坚强的诗性气质，正是这种精神气质酝酿、催生了“俄罗斯理念”。

刘小枫曾就“俄罗斯理念”而展开对俄罗斯文化特质的思索：“俄罗斯理念……意指俄罗斯传统思想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素质。这种精神素质由俄罗斯文化诸形态鲜明、突出的体现出来。”^⑤18世纪俄罗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登上了新台阶：文化克服了地域性和等级制度的局限性，赋予地域和等级制度中最具价值的文化特征以全民族的意义。在这期间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拉吉舍夫被誉为“俄罗斯知识者的始祖”、“十八世代俄罗斯最卓越的人”，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

旅行记》(1790)以手抄本形式始终在知识分子和开明贵族之间流传。有如此言：拉吉舍夫是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既接受了西方启蒙主义的自由思想,又与俄国宗教团体共济会有关)。普希金是第一个摆脱宫廷诗人地位的作家。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忧伤”时,当普希金说“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时,俄国知识分子就诞生了。面对着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和人民受伤的灵魂,“忧伤”和“忧郁”,成了整整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基调。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俄国知识分子用全部智慧和人格,奠定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⑥所谓独特的传统即反抗黑暗、暴力,追求真理与自由;苦行僧一般的坚毅;对人民深刻的关怀等,这些铸造了俄罗斯精神:在苦难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中激发起拯救的信心。所有这些明显地体现在十二月党人身上。

十二月党人是一些与拉吉舍夫并肩耸立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十二月党人大多出身于贵族阶层,但追求自由和真理是他们天然的秉赋,其孤高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良知的苏醒。在此意义上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这个阶级给他们的不是鲜花和香槟酒,而是流放和绞刑架。而他们被流放和送上绞刑架的罪责仅仅是,对民族不可遏止的忧虑和挚爱,对劳苦大众悲天悯人的关注与同情。他们为此终生漂泊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不仅肉体上如此,而且精神上也是如此。最终,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在苦寒的冰雪天地内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以此化解着俄罗斯的苦难,抚慰着俄罗斯的灵魂。

有人说,一部俄国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思想家被放逐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所指的就是十二月党人及其诗歌创作,当然,也包括与其有精神血缘关系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曾被高尔基称为“十二月党人中的席勒”,他的诗作《致宠臣》和《公民》等表达了对专制独裁的刻骨仇恨和对自由民主的无限渴望;奥多耶夫斯基在服苦役时期开始写诗,他曾代表十二月党人写诗答赠普希金:“星星之火将会燃起熊熊火光”,列宁曾用他的这句诗作为《火星报》刊头题词。格林卡的《囚徒》和《三套马车》早已成为俄罗斯的经典,其中的受难精神、悲怆基调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在此意义上,十二月党人因为他们自己而高贵,因为他们的流放及其创作而圆满。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十二月党人有着精神血缘的相通性,可谓准十二月党人。普希金的《自由

颂》曾经给予十二月党人以精神上的启发和意志上的鼓舞,《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更是赞颂十二月党人的高贵品性和对自由的无限向往;莱蒙托夫在贵族寄宿中学时就秘密阅读雷列耶夫的崇尚自由的诗篇,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传统,曾以一首惊世骇俗的《诗人之死》哀悼了普希金这轮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陨落。

十二月党人(包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把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写进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流亡者苦难的人生遭际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品质,从而使流放成为俄罗斯文学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到,“十九世纪的文学是适宜于朗读的文学,因为它有着一种总体上的‘忧伤’的基调,也就是浪漫的、抒情的、可以朗读的基调。……因此,关于受难的精神、忧郁的灵魂,以及如何才能获救的问题,成了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话题,也成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基本主题”^⑦。

毋庸讳言,“文革”期间的确存在着这种现象:“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执着探索精神,在他们身上迷失了,他们选择了‘脱胎换骨’,选择了紧跟队伍的‘革命路线’。”^⑧但却不能排除,十二月党人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压抑而不满,目睹农奴制社会黑暗现实愤懑而无奈,由此激发的反抗情绪和叛逆精神、乌托邦理想和幻想,都和经历“文革”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先觉者声气相通;而他们的流放诗歌所展示出的那种独特的现实批判意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巨大的道德深度、沉重的悲怆风格,也很容易引起“平校文学”或“流放文学”中牛汉们的精神感应和灵魂契合。牛汉有关干校的诗作与十二月党人的相通之处更在于其“深刻广大的悲悯情怀、对于民族痛苦的承担、对于生命尊严的捍卫,使他的胆汁质诗人形象,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人格和良知的坐标”^⑨。

二

一旦进入历史褶皱和文本内部,最先领略到的是浸透于牛汉的诗歌肌质中的那种领受苦难的创作品质。

牛汉自称:“没有我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会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痛苦而丰富的人生,我的诗必定平淡无奇。”^⑩邵燕祥就认为,与

牛汉同资历或年龄小于他的许多诗人，都顺着自己的模式写下去，也自甘平庸下去，而牛汉没有。上帝选择他做真正的诗人，所以把他投入炼狱。干校时期的牛汉就像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那样，在诗歌中艺术地再现了流亡者苦难的人生遭际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品质。经历了“文革”尤其是五七干校那种“苦难的历程”后，牛汉体验了生命被困囿和灵魂被摧残的痛苦：“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皮肉的神经和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感觉去感受世界，……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⑩在牛汉的诗思中，苦难与创伤或“伤疤”不止激发了诗人的诗兴，同时影响了他认识世界与感觉世界的方式。

《半棵树》据说是有感于冯雪峰削瘦的形象而写。其实，这株遭受雷击却傲然挺立的半棵树何尝只是冯雪峰命运的写照，它更渗透着诗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受尽摧残但宁折不弯。尤其是它的结尾：“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不止是宿命的宣告，更是带血的预言。而同样是写“树”，《悼念一棵枫树》不同于“半棵树”的依然屹立，这棵枫树被整棵地伐倒；伤害的也不止是枫树本身，而是一个民族所遭受的难以弥合的时代的苦难和心灵的戕害，牛汉为此悲愤地写下“悼词”：“村边的山丘/缩小了许多/仿佛低下了头颅//伐倒了/一棵枫树/伐倒了/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

的确，牛汉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写作方式在诗的炼狱里穿行：“那些年/多半在静静的黎明/我默默地写着诗/又默默地撕了/撕成小小的小小的碎片/(谁也無法把它复原)/一首诗变成数不清的蝴蝶/每一只都带有一点诗的斑纹/(谁也無法把它破译)/它们乘着风/翩翩地飞到了远方”(《蝴蝶梦》)；同时，受难的精神使他的诗穿透了现实表象的遮蔽与现存秩序的拘役，而突入生命存在的本质，于是在牛汉的笔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正是在形而上的生存焦虑与形而下的现实苦难间的奔突和磨砺，使诗人及其诗歌“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鹰的诞生》)。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牛汉的诗歌创作显得与众不同：一般人只是在承受苦难、咀嚼苦难，而牛汉却能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美学

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由此，一条通向灵魂炼狱同时又重新发现未来的道路得以铺展开来，真正的灵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开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在牛汉的诗歌中，对苦难的领受是通过生命的担当来完成的，即领受苦难和生命担当是一体两面的构成。这其实是牛汉用诗歌面对灵魂的一种方式。由此，牛汉在诗歌中以痛楚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人生感悟，将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融于一体：一方面呈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人的生命存在状况的沉思和拷问，把生命历程中的大苦难、大折磨凝结为一种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的普遍性的生命哲学思考，并聚结为挥之不去的，渗透在心灵之中和骨髓之中的人格力量。

《华南虎》中的“我”与“老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歌形象：“华南虎”的困厄处境以及它的内心“屈辱”和对自由的希望，与在特定处境中的诗人发生了“命运的邂逅”，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牛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地内嵌于起初作为客体出现的“老虎”之中，两者的精神息息相通合二为一。实际上，在牛汉的诗歌《华南虎》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原型意义。“华南虎”/“我”所显露出的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以及对伤戮与困境的坚韧反抗，无疑是牛汉有关干校的诗作的基本话语主题。

问题更在于，牛汉不屑于对生命的苦难进行“诗化”，而是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锤炼在诗思中，真实塑造那些被邪恶和残暴所戕害而顽强抗争的生命意象。在《鹰的诞生》里，“鹰的巢，/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雏鹰也是诞生于风雨雷霆之中。而《隼子》则以急切的呼告对步入险境的生命发出警告。应该说，专注于生命的困厄缘于牛汉特殊的“屈辱的处境”，正是“屈辱的处境、自恃高洁的人生理想”使得诗人从“根的品性、姿态、苦难，获得了难以衡量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了值得珍贵的“命运的邂逅”^⑪。

牛汉曾说自己喜欢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其笔下的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诗中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在坚韧地领受苦难中自觉地以生命来承担。于此，创伤，是苦难留给生命的疤痕；而顽强，则是生命反抗苦难的巨大力量。在苦难与抗争的震撼人心的搏斗中，生命力得到释放和弘扬。它给人一种康德所谓的“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的艺术感觉和审

美领悟。牛汉的创作是生命的诗学。这使得他在“文革”后“归来的诗人”中独树一帜。

如果说，牛汉早期诗作以“沉郁”为基调的话，那么他“文革”时期的作品可以用“悲慨”来概括^⑬。这里所谓的“悲慨”基调用牛汉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即“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悲慨自然缘于对苦难的领受，也出于沉重之极的生命担当。

不难发现，在牛汉有关干校的诗作中，十二月党人诗歌中的那种在苦难中孕育伟大、在绝望中激发起拯救信心的悲怆之感俨然再现。他的诗作不啻为一种“冷峭的哲学”。

牛汉在干校写的诗歌有一种对生命的真切体验，有彻骨的荒凉，与诸如被伐倒的枫树、被斫伐的灌木、被囚困笼中的华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长的根块等交织在一起，从中呈现了灵魂在砍伐与伤残中火花迸溅的真相。客观地说，同样是表现困厄与反抗，比如同样是描绘困厄和反抗中的鹰，别的诗人和作家强调其蔑视暴风雨和自由、舒展的特征；牛汉笔下的鹰当然也善于高飞远举——“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它们发出“激越而悠长的歌声”，当人间还“沉在昏黑之中”，它们穿越云层，“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但牛汉更强调其艰苦搏斗的一面，在惨烈的想象中显示出鹰的自由刚烈的性格所必然付出的生命代价。

也可以说，牛汉的诗作正如《反刍》所抒写的，在领受苦难——“荆棘在胃”中诗人成了一只“口吐鲜血而歌唱的荆棘鸟”，这样的“一步一滴血”的写作堪称是现代式的“苦吟”，因而也“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惟其如此，牛汉的诗歌才显得悲怆而不悲观，因为牛汉的诗是永不为时代所驯化、不为苦难所摧折的独立人格与诗化人生所发出的呐喊和追求。牛汉诗歌的悲慨基调与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具有某种耦合性——牛汉的“悲凄的理想主义”与鲁迅式的“忧愤深广”的相同之处在于：肩负着时代的重压，一面反击着黑暗，一面在沉默中生长与前行。

三

倘若将“五七干校”视为一个特定的创作语境，牛汉的诗歌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化的创作标本，那么，在此语境中同样具有类型学意义，并与牛汉形成了可比性的则是郭小川和杨绛。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语境是时代

给定的，但个人与语境的关系则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此而言，从牛汉身上彰显的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本色，而郭小川则在“战士”与“诗人”的选择中逐渐凸显了“战士”特质；杨绛既不同于牛汉，更异于郭小川，展露出的是淡泊自重、宠辱不惊的文人风度。

比较之下，牛汉也许不像郭沫若的诗那样具有原创性，也许不及艾青的丰富，但比之郭沫若他更具有人格的完整性；比之艾青，牛汉更尖锐更决绝。牛汉在干校期间写的《改不掉的习惯》曾这样吟咏着：“聂鲁达伤心地讲过/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改不了许多悲伤的习惯——/……他想写的诗/总忘记写在稿纸上/多少年/他没有笔没有纸/每一句抒情/只默默地/封记在心里/我认识这个诗人。”之所以与“这个诗人”很熟悉，因为他是牛汉的友人胡风、绿原，他更是牛汉本人——不啻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白”。

牛汉曾是“七月诗派”的一员，“七月诗派”将鲁迅对人格独立性的不懈追求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熔铸为一体，把诗美追求和创作使命统一起来；他们的笔下饱含着对民族危机和民众苦难的深切忧患与沉重悲愤，并在坦诚而纯真的鸣唱中传达出浪漫的赤子之心。然而在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力量的年代里，尽管“七月诗派”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甚至像十二月党人那样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长期处于流放的状态，但他们在沉沦中以诗歌作为灵魂救赎和精神振作的方式，表达的是对一代人生存困厄的写照和对一个昏昧时代的批判。犹如普希金在《纪念碑》中所云：“——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牛汉无疑是“七月诗派”中坚守知识分子品格之最坚韧者：“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⑭在2003年4月的“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指出，骨气对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牛汉身上没有任何的奴颜媚骨，有的是一副硬骨头，堪称文学界的典范。著名诗人邵燕祥则表示，牛汉诗作《夜》的最后一句“诗不颤抖”很好地说明了牛汉的为人。此言甚是！牛汉诗歌之所以令人称道，是因为：有个性而无角色化的定位。牛汉的诗作从来不脱离时代，但他又摒弃了“七月诗派”中常见的“代言人”冲动，而代之

以对个人心声的挖掘：他的诗里，有痛苦，有愤怒，有觉醒，有精神的追寻和魂灵的叩问，有深邃、崇高的境象与诗思，唯独没有丝毫奴隶哲学和庸人的气息。他的文字，是拒绝庸俗、抵抗堕落、超越苦难、不甘幻灭’的诗性记录。”^⑤牛汉笔下的“华南虎”无疑是自己及其同类者精神性格的写照：它“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骨子里蕴藏的那股涌动的威严居然压迫着、威逼着困困它的人们。无论看客“用石块砸”、“厉声呵斥”，还是“苦苦劝诱”，“它都一概不理”。它置身于龌龊的人世间，并深味这世界的苦难、凄凉与无望，内心感到的是无尽的孤独和忧愤。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暗示着它为了自由作过勇士般无畏但却徒劳的反抗。因为抗争是它活下去的全部寄托和现实意义，是它高贵灵魂的有力呈现。铁笼终究禁锢不住“不羁的灵魂”，壮阔、博大的“苍苍莽莽的山林”才是它灵魂和力量的家园。

可以说，牛汉通过自身的写作，向处于历史“深渊”期的中国诗歌重新提出了“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一久远而又迫近的命题。易言之，在牛汉诗歌中读到的是：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除了这些极为重要的任务——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之外，还得加上其他的，而我相信这些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义务去完成。毕竟，许多小说家、画家、诗人，……已经在美学作品中体现了他们人民的经验，而且这些美学作品也被认为是伟大的杰作。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广泛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⑥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忧伤”时俄国知识分子就诞生了，同理，当牛汉宣示“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时，“文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相对于牛汉来说，郭小川在干校的创作则是在长期的“战士”与“诗人”的身份焦虑中，完成了从“诗人”向“战士”的某种转向。众所周知，“战士”或“诗人”的身份焦虑是郭小川建国以来一直拥有的精神症候。诗歌创作固然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但革命事业更是他体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这就导致了两重身份间始终存在着尴尬。

毋庸讳言，郭小川在50年代中期曾就“战士”与“诗人”的身份焦虑进行过思索，就像他在《望星空》里所表达的，一方面既有的政治秩序要求彻底改造诗人；另一方面，诗人对革命的想象是包含着人道主义与自由精神的，他将想象投射到对革命前景——一个新世界的期待中。面对在这样的两难处境，诗人于是在自己的感受和时代之间，在压抑不住的声音和事实上对他构成压抑的时代精神之间不断寻找平衡。郭小川带着犹豫与痛苦、无奈与矛盾在“战士”与“诗人”之间选择着。郭小川体现了在时代“精神”发生畸变时期一个诗人所承受的冲突，也体现出他对精神的忠诚与对一个自身参与建设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精神”与一个“时代”之间关系的状况。诗人是时代精神向度的一个敏感的“测震仪”^⑦。

在干校创作的诗歌中，虽然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真诚和鲜活生命力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和损害，他也不大认同那个年代中泛政治化的艺术观，但作为一名“战士”的他最后完成了个人向时代洪流的归附。在其最具典范性的作品《团泊洼的秋天》中，他把个体的生存境遇置于“团泊洼”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这里，蝉、麻雀、蛙的嘈杂声音都消失，“野性的河流”不再“喧哗”，单调死寂；同时，“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自由言说的空间萎缩了，个性变得模糊不清，生命个体存在意义与历史现实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只是当抒情主人公的内心远离焦虑而走向精神明彻时，他的诗歌才变得单纯且明朗：“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诗歌由此成为抒情主体展示革命忠诚的深情表白方式；“战士”与“诗人”之间的身份焦虑迎来了主体意识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这不仅是他历经精神磨难后“重振士气”的宣言，更是对诗歌“介入”现实和重建生存意义的精神期待^⑧。要言之，郭小川在“战士”与“诗人”的权衡中逐渐丢失了《望星空》中的诗性哲思而强化了其政治抒情诗中的“战士”特质。

如果说牛汉是自觉型存在的知识分子类型，那么杨绛则是一种自为性生存的文人。恰如《干校六记》结尾处的言说：“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

是依然故我。”

究其缘由，杨绛出身书香门第，优越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某种“贵族”气质。其性情淡泊，视界甚高，不随流俗，同时又饱经尘世变换，领略了风霜雪雨。这使她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乃至把苦难的生存体验升华为审美愉悦。由此观之，《干校六记》虽记录的是一个黑暗年代中的种种艰辛，然而作者拉家常般地“任心闲话”，不自怜自怨反而风趣丛生。其淡泊宁静一方面使她能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展示动荡岁月的乖谬，同时亦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的一面，这是文人式作家的典型性格。须知，散文是最具个人化、最能展示作者人格气质的文体。而《干校六记》的神韵直追明清文人的小品文，其举笔成文时透露出的平淡清和，将几分苍凉凄楚尽付平实的笔调中，并在一种冲淡自如的境界中显示出作者心灵的自由超脱、性情的谦和练达。

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⑩，有理由认为，《干校六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中淡化了价值判断和道德诉求。尽管它的笔触亦涉及到对时代重大事件的追忆，但它只写特定年代的小点缀、小插曲，只是以近乎白描的叙事来写兴衰、荣辱、哀乐，可谓“以虚显神”，从而带有一种超脱高妙的气质。与此同时，《干校六记》里的“自我”也是凸显的，在不动声色的叙说中表现的是一个通达世情、透悟人生而始终不改高贵本色的杨绛：“作者的‘故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士’，任凭怎样‘九蒸九焙的改造’，我还是依然故我’。《干校六记》或明或暗地显示了作者特有的一种高贵的倔强。……这里面的‘自我’是纯净的、高贵的，也是顽固的，‘自我’无需借助忏悔来获得，当然也不是主流话语的附庸，更不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诗化散文’中的抒情‘伪自我’，而是一种自由、自适、‘自以为是’的个体精神的象征。”^⑪可以说，《干校六记》不啻为文人气质和人格范式的集中体现，或者说，这首先不是写法问题，而是存在方式的问题。

总之，牛汉、郭小川、杨绛，作为“干校文学”的创作典范，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成就了“干校文学”的不无合理的文学生态。其情其状如孙郁在《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中所说：“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⑫

注释：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② 王家平：《“文革”时期流放者诗歌简论》，《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③⑧ 转引自刘保昌《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④ 毕光明：《沉沦灵魂的自我救赎》，《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⑤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

⑥⑦ 张柠：《白银时代的遗产》，《读书》1998年第8期。

⑨ 燎原：《中国当代诗人点评》，《星星诗刊》2005年第7期。

⑩ 牛汉：《牛汉诗选·代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⑪ 牛汉：《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⑫ 牛汉：《我与草木的根》，《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页。

⑬ 杨志学：《牛汉：崇高诗美的创造者》，《文学前沿》第7辑。

⑭ 转引自鄢烈山《书与人：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9月18日。

⑮ 王培元：《牛汉：“汗血诗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⑯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5页。

⑰ 陈竞：《诗人该如何应对时代？》，《文学报》2010年1月28日。

⑱ 巫洪亮：《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⑲ 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邵大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⑳ 范培松、张颖：《钱钟书、杨绛散文比较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㉑ 孙郁：《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方法》1999年第1期。

作者简介：彭在钦，男，1964年生，湖南浏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湘潭，411201；杨经建，男，1955年生，湖南浏阳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辑 刘保昌）